

从人均收入视角看中国对外援助义务的履行

黄梅波 熊青龙

内容提要 本文首先分析了发达国家发展援助的履行状况,探讨了现有基于国民总收入筹资模式的不足,并创新性地提出了基于人均收入水平的改进筹资模式。其次,利用发达国家的数据对人均收入筹资模型进行了参数估计。最后,本文探讨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履行情况,如果按照人均收入模型,发现我国长期以来实质上是在“超标准”实行对外援助;与此同时测算了四种援助模式下中国未来 10 余年内的援助规模。本文的中心结论是:当前的国际发展援助筹资规则并不科学,而人均收入水平应纳入考虑因素;此外,按照人均收入水平看,中国当前在超标履行国际援助义务。

关键词 中国援助义务 官方发展援助 人均收入水平

近年来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疲软,而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迅速崛起,其国际地位持续上升,与此同时国际上要求新兴市场国家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呼声也不断高涨,这些责任涵盖国际援助、环境保护、气候变化、市场开放和金融稳定等方面。对于国际发展援助而言,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对新兴市场国家施加压力,要求新兴市场国家分担更多国际援助义务,提高援助金额,弥补国际援助资金缺口。

对于中国而言,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而人均收入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在存在大量贫困人口的同时,依然向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

助。实际上中国政府当前正面临着内外的双重压力,一方面是国内民众对对外援助的质疑,另一方面是国际社会觉得中国援助得不够。中国究竟应该向外提供多少援助?现有按照经济总量基准提供援助是否合理?应该如何衡量中国在提供 ODA 方面的表现?这些正是本文尝试回答的问题。

本文提出了 ODA 筹资目标应基于人均国民收入指标,而不应基于国民总收入指标,由此构建了相应的 ODA 筹资模型,并利用 OECD 国家的 ODA 数据,对新模型的相关参数进行了简单估计。本文按照发达国家的援助行事标准来测度新世纪以来中国

的援助情况,认为中国在“超标准”履行发展援助义务。同时假设了四种不同援助模式,并基于不同援助模式测算出中国 2025 年前的援助规模变化情况。

一、现有筹资模式的履行、不足与改进

多年以来,联合国要求发达国家按照国民总收入(Gross National Income, GNI)的 0.7%的目标提供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绝大多数发达国家也承诺按照 0.7%的目标履行义务。早在 1970 年的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中,按照 GNI 的 0.7%目标提供官方援助首次正式提出,并在后来的多次

表 1:2003-2012 年各主要国家和组织援助数据 (ODA/GNI,%)

| 年份 | OECD 平均 | G7 平均 | 美国 | 日本 | 德国 | 法国 | 加拿大 | 英国 | 意大利 |
|------|---------|-------|------|------|------|------|------|------|------|
| 2003 | 0.24 | 0.21 | 0.15 | 0.2 | 0.28 | 0.4 | 0.24 | 0.34 | 0.17 |
| 2004 | 0.25 | 0.22 | 0.17 | 0.19 | 0.28 | 0.41 | 0.27 | 0.36 | 0.15 |
| 2005 | 0.32 | 0.3 | 0.23 | 0.28 | 0.36 | 0.47 | 0.34 | 0.47 | 0.29 |
| 2006 | 0.3 | 0.27 | 0.18 | 0.25 | 0.36 | 0.47 | 0.29 | 0.51 | 0.2 |
| 2007 | 0.27 | 0.23 | 0.16 | 0.17 | 0.37 | 0.38 | 0.29 | 0.36 | 0.19 |
| 2008 | 0.3 | 0.25 | 0.18 | 0.19 | 0.38 | 0.39 | 0.33 | 0.43 | 0.22 |
| 2009 | 0.31 | 0.26 | 0.21 | 0.18 | 0.35 | 0.47 | 0.3 | 0.51 | 0.16 |
| 2010 | 0.32 | 0.28 | 0.21 | 0.2 | 0.39 | 0.5 | 0.34 | 0.57 | 0.15 |
| 2011 | 0.31 | 0.27 | 0.2 | 0.18 | 0.39 | 0.46 | 0.32 | 0.56 | 0.2 |
| 2012 | 0.31 | 0.28 | 0.19 | 0.17 | 0.38 | 0.45 | 0.32 | 0.56 | 0.13 |

数据来源:OECD/DA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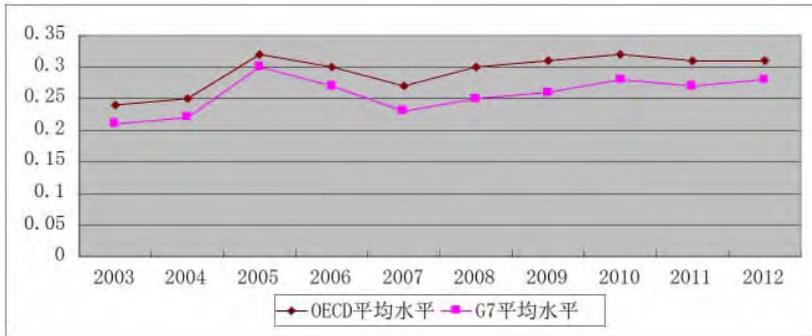


图 1:OECD 和 G7 的平均援助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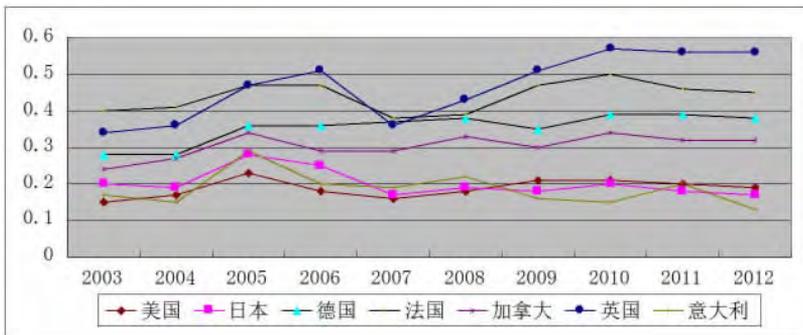


图 2:G7 各国的援助水平

底已达到 1300 亿美元,但援助金额与其承诺目标还相差甚远。绝大部分发达国家没能达到约定的 0.7%的目标,其援助金额占比一直在 0.2 至 0.4%之间,导致每年援助资金缺口 1500 亿美元左右。2003-2012 年的数据显示 OECD 的平均援助水平一直在 0.3%附近徘徊,而 G7 国家的平均水平还要略微低于 OECD 的水平,G7 国家中如果按照援助占 GNI 比重来衡量,最慷慨的国家是英国和法国,而最吝啬的国家是意大利和美国。(数据参见表 1、图 1 和图 2。)

从表 1、图 1 和图 2 可以清晰地知道,整体看,2003 年以来发达国家没有很好履行援助目标,实际所提供的援助离设定 0.7%的目标相距甚远。

(二)现有筹资模式的不足

实际上,联合国要求发达国家按照 GNI 的固定比例提供 ODA,可用公式表示为:

$$ODA = a \times GNI \quad (1)$$

其中,a 表示比例系数(目前 a 可以视为等于 0.7%),ODA 表示一国提供官方发展援助金额,GNI 表示一国的国民总收入。

按照 GNI 的 0.7%的比例来安排各国提供 ODA 金额的大小,其背后的逻辑是国力强的国家应多提供援助资金,国力弱的国家可相应少提供援助资金。但是这里衡量一国国力使用的是一国国民总收入,而非人均国民收入,实际上忽视了国际援助人均负担的问题。

从政治上来讲,各国按照经济总量的 0.7%的提供发展援助,

国际会议和协议上得到重复确认,其中包括非常重要的 2002 年蒙特雷筹资大会。蒙特雷筹资大会认为国际社会提供足够的援助是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关键,并重申了发达国家应提供 GNI 的 0.7%资金进行官方发展援助。最近,在 2012 年“里约 +20”可持续发展大会上,又重申要求发达国家履行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占其 GNI 的 0.7%的官方发展援

助。总之,按照国民总收入的 0.7%的标准提供发展援助成为考察发达国家履行援助义务的关键指标。

(一)发达国家援助义务的履行状况

发达国家提供援助的主体是 OECD 的发展援助委员会(DAC)国家,OECD 国家占据国际 ODA 的绝大部分。虽然发达国家官方发展援助金额持续增加,2012 年

表面看似比较“公平”,实则不公平。事实上发达国家间人均收入也存在较大差距,现有筹资模式不能体现人均收入高的应负担更多的原则。另外,将来逐渐会有更多新兴市场国家也将步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如果简单按照 GNI 基数来分配资金的筹集,简单按照 0.7%的原则提供援助,可能会导致人均收入 1 万美元和人均收入 5 万美元的国家的人均援助负担率都相同,不能体现收入差距的事实,这其实是一种新的不公平。所以说,援助资金的筹集应该既要考虑各国的经济总量水平,也要考虑人均收入水平。

(三)基于人均收入指标的改进

国际援助的终极目标是消除贫困,而贫困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是按照日人均收入来衡量的。官方发展援助的主体是国家,但是承担官方发展援助的是一国的纳税人,人均收入是衡量一国财富的更好的指标。如果将国际援助看成一种国际转移支付形式,那么资金提供方理应要考虑人均收入的指标来安排转移支付,即人均收入越高,则应该提高援助负担率,类似于一种累进税收。

我们不妨用 ANI (Average National Income)表示人均国民收入,用 N 表示各国人口数量,则, $GNI=ANI \times N$ 。用 ODA 表示各援助国官方发展援助金额,用 GR (Gross Rate) 表示官方发展援助金额与国民总收入之比,即,

$$GR=ODA/GNI \quad (2)$$

用 AODA (Average ODA)表示援助国人均官方发展援助金

额, AR(Average Rate)表示人均官方发展援助金额与人均国民收入之比,即,

$$AR=AODA/ANI \quad (3)$$

由于 $AODA \times N=ODA$,且综合式(1)、(2)、(3),显然有:

$$AR=(AODA \times N)/(ANI \times N)=ODA/GNI=GR \quad (4)$$

依据前文的论述,国际援助的筹资目标如果着眼于人均国民收入(用 ANI 表示)来制定累进比例,而不是国民总收入(GNI),我们可以建立下述关键等式:

$$GR=AR=b_1+b_2 \times ANI \quad (5)$$

其中 GR、AR 和 ANI 如前文定义, b_1 是基础比例系数, b_2 是随人均收入水平累进的系数。等式(5)的含义是:各国提供援助比例应该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基础比例,另一部分是按照人均收入水平增长而增长的比例。

由公式(5)自然可以得到等式:

$$ODA=b_1 \times GNI+b_2 \times (ANI \times GNI) \quad (6)$$

如果忽略 GNI 与 GDP 差异, ANI 与人均 GDP 的差异,可直接用 GDP 代替 GNI,用 AGDP (代表人均 GDP)代替 ANI,则等式(6)可以写为:

$$ODA=b_1 \times GDP+b_2 \times$$

$$(AGDP \times GDP) \quad (7)$$

等式(7)意味着援助金额 ODA 主要取决于 GDP 和 AGDP 的影响,只不过其中 AGDP 是以交叉形式与 GDP 联合影响 ODA。

二、人均收入筹资模型的参数估计

至今为止,本文还未能确定新模型的参数,实际上确定新模型的参数必需依赖于国际社会的协商,但是如果从理论上先确定相关的参数,再利用所估计的模型与中国的对外援助进行比较分析,也许会得到有益的洞察。因此现在回到对等式(5): $GR=AR=b_1+b_2 \times ANI$ 的参数估算上来。

(一)数据选择

OECD 中的 34 个国家都对外提供发展援助,由于包括非 DAC 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范围更大,有更多较低人均收入的国家包含在内,经济水平更接近新兴国家的情况,于是选用全部 34 个 OECD 国家作为样本。根据本文模型参数估计的需要,选用横截面模型进行估计更加合理。ANI 是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各年各国人均国民收入计算而来,同时为了减少经济数据的

表 2:2009-2011 年 OECD 国家 ANI 与 GR 平均值

| 国家 | 澳大利亚 | 奥地利 | 比利时 | 加拿大 | 智利 | 捷克 | 丹麦 | 爱沙尼亚 | 芬兰 | 法国 | 德国 | 希腊 |
|-----|-------|-------|-------|-------|-------|-------|-------|--------|-------|-------|-------|-------|
| ANI | 46063 | 47280 | 45563 | 43566 | 11003 | 18310 | 59363 | 14557 | 47147 | 42330 | 43363 | 26303 |
| GR | 0.32 | 0.297 | 0.577 | 0.32 | -0.06 | 0.123 | 0.88 | 0.103 | 0.54 | 0.477 | 0.377 | 0.17 |
| 国家 | 匈牙利 | 冰岛 | 爱尔兰 | 以色列 | 意大利 | 日本 | 韩国 | 卢森堡 | 墨西哥 | 荷兰 | 新西兰 | 挪威 |
| ANI | 12857 | 35987 | 42467 | 27237 | 35470 | 41510 | 20080 | 72736 | 9000 | 48940 | 28940 | 87013 |
| GR | 0.1 | 0.283 | 0.523 | 0.073 | 0.17 | 0.187 | 0.113 | 1.02 | -0.05 | 0.793 | 0.273 | 1.143 |
| 国家 | 波兰 | 葡萄牙 | 斯洛伐克 | 斯洛文尼亚 | 西班牙 | 瑞典 | 瑞士 | 土耳其 | 英国 | 美国 | | |
| ANI | 12373 | 21590 | 15973 | 23757 | 31493 | 50920 | 72123 | 9787 | 39163 | 47310 | | |
| GR | 0.083 | 0.277 | 0.09 | 0.137 | 0.393 | 1.037 | 0.427 | -0.024 | 0.547 | 0.207 | | |

数据来源: Word Bank 和 OECD/DAC

注: ANI 单位为美元, GR 单位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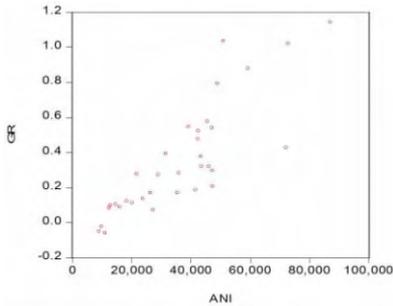


图 3:ANI 和 GR 分布散点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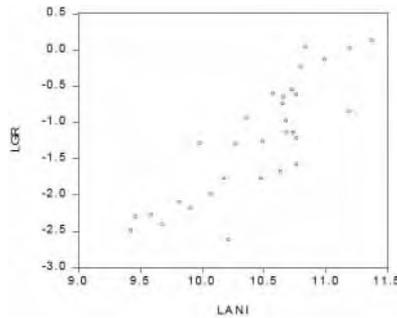


图 4:LANI 和 LGR 分布散点图

波动性,把 2009-2011 共 3 年的平均数作为各国的 ANI 数据;同样,将各国 2009 至 2011 共 3 年的 GR 的平均数值作为 GR 数据(具体数据参看表 2。)从这三年的平均数值看,智利、墨西哥和土耳其是 ODA 资金的净输入方,其余国家都为 ODA 资金的净输出方。

(二)数据处理和参数估计

为了消除异方差问题,本文将数据进行自然对数化处理,用 LGR 表示取自然对数后的 GR 数据,LANI 表示取自然对数后的 ANI 数据;为了使对数化有意义,将三个资金净输入方国家(智利、墨西哥和土耳其)剔除,因此样本数为 31 个。

将 ANI(LANI)和 GR(LGR)的散点图描绘如图 3 和图 4,图 4 的数据是取自然对数后的图形。综合图 3 和 4,可以发现 GR 同 ANI 之间呈现较强的线性关系,进一步计算发现 GR 同 ANI 的线性相关系数为 0.81,LGR 和 LANI 的线性相关系数为 0.85,这也印证了采用线性模型的合理性。

本文用 OLS 方法,回归结果如下:

$$LGR = -15.2698 + 1.3422 \times LANI \quad (8)$$

$$t = (-9.3201)(8.5705)$$

其中, $R^2=0.7169$, 调整的 $R^2=0.7072$, $F=73.4531$, $DW=1.8332$ 。该模型表明,模型能够拟合数据的 70%以上,t 统计量显示回归系数是显著的;在 5%的显著水平上,DW 值显示残差不存在序列自相关性;在 5%的显著水平上,用 White 检验异方差,模型不存在异方差问题。模型表明,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援助比例是增加的。由于对数线性模型中的系数,实质上度量的是因变量对自变量的弹性。因此,该模型系数显示人均国民收入 (ANI) 每提高 1%,则可以引起 GR 提高 1.3422%;人均国民收入 (ANI) 每降低 1%,则 GR 降低 1.3422%。

等式(8)实际上是用发达国家的横截面数据所拟合出的一条援助与人均收入的直线,它能够帮助我们按照人均收入水平来衡量各国的援助履行情况。当然,这种经济意义只是建立在“默认”现行 OECD 国家 2009-2011 年的援助行为之上,其目的是为中国的援助义务提供一个简单的参考基准。

三、中国对外援助的履行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逐渐加大了对外援助,中国正从传统的受援国向援助国地位转变,正如本文开头所说一样,国际社会对中国当前的援助规模似乎是不满意的。因此,有必要对中国对外援助状况进行评估,以科学评判我国是否恰当地进行了对外援助。

(一)中国对外援助履行状况

实际上,中国尚属于发展中国家,使用发达国家的标准显然是不合适的。但是,目前国际上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援助义务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使我们缺乏对中国援助状况的一个比较基准。那么我们不妨按照人均收入标准来估算中国对外援助的履行情况。

表 3:2002-2011 年中国对外援助

| | 2002 | 2003 | 2004 | 2005 | 2006 | 2007 | 2008 | 2009 | 2010 | 2011 | 2012 |
|------------|----------|--------|----------|----------|----------|--------|----------|--------|----------|----------|----------|
| A(现价亿元) | 50.03 | 52.23 | 60.69 | 74.7 | 82.37 | 111.54 | 125.59 | 132.96 | 136.14 | 159.09 | NA |
| GNP(现价亿元) | 119095.7 | 134977 | 159453.6 | 183617.4 | 215904.4 | 266422 | 316030.3 | 340320 | 399759.5 | 468562.4 | 516282.1 |
| A 占 GNP 比重 | 0.042 | 0.039 | 0.038 | 0.041 | 0.038 | 0.042 | 0.04 | 0.039 | 0.034 | 0.034 | - |
| ANI(现价美元) | 1100 | 1270 | 1490 | 1740 | 2040 | 2480 | 3050 | 3610 | 4240 | 4900 | 5720 |
| 公式 8 测算比例 | 0.0028 | 0.0034 | 0.0042 | 0.0052 | 0.0065 | 0.0084 | 0.0111 | 0.0139 | 0.0173 | 0.0210 | 0.0258 |

注:A 代表援外支出,GNP 代表国民总收入。单位:亿元人民币。ANI 表示人均国民收入。ANI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2002-2011 年对外援助数据来自于 2003-2012 年各年《中国统计年鉴》,GNP 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 2013》。

表 4: 中国与主要新兴国家贫困水平

| 国家 | 中国 (2008) | 阿根廷 (2009) | 巴西 (2009) | 印度 (2010) | 印度尼西亚 (2011) | 俄罗斯 (2009) | 南非 (2009) | 沙特阿拉伯 |
|---------------|--------------|---------------|--------------|--------------|-----------------|---------------|--------------|-------|
| 总贫困人口 (百万) | 157.08868 | 0.371443 | 11.88034 | 393.9981 | 39.49992 | 0 | 6.791385 | NA |
| 贫困率 | 11.8% | 0.92% | 6.14% | 32.68% | 16.20% | 0 | 13.77% | NA |

注:总贫困人口按照每天低于 1.25 美元(购买力平价)标准计算。

数据来源: World Bank

现将中国 2000-2011 年的对外援助数据汇总于表 3。由表 3 可知,如果直接按照 GNI 的 0.7% 标准计算,中国显然是没有履行国际发展援助责任。如果按照 OECD 国家的实际援助规模平均为 GNI 的 0.3% 水平计算,中国也没有达到这一标准。

从前文的分析可以得知, OECD 国家的实际援助规模平均为 GNI 的 0.3%, 距离 0.7% 目标还相距甚远, 这里暂且不考虑 OECD 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接近 10000 美元的智利、墨西哥、土耳其还处在接受援助的边缘, 不妨让人均国民收入比上述 3 国低得多的中国也参照模型预测的 OECD 的现有援助标准, 也就是按照 OECD 高收入国家的行事方式进行援助。如果按照本文提出的人均收入的模式(公式 5)来衡量, 即同样按照现在发达国家的援助“标准”, 并使用等式(8)所得到的参数来估算。经测算, 中国长期以来援外金额均超出新模型的目标值(参见表 3)。从表 3 数据可以发现, 我国对外援助占 GNP 之比大致维持在 0.04% 附近, 这一数据可以大致认为是我国 O-DA/GNI 之比例, 也基本上高于基于人均收入模型(见等式 5)的简单测算值。例如, 2011 年中国的援外支出达 159.09 亿元人民

币, 按照当年汇率计算折合 24.63 亿美元, 援助占我国 GNP 比例达 0.034%, 高于基于新模型得到的理论比例。可见, 如果按照新援助模型, 比照 OECD 国家近年的援助行为, 即使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 长期以来也已超额履行了对外援助义务。

然而, 中国在对外进行发展援助时, 还应考虑国内的贫困问题。中国近年来经济虽快速增长, 但其人均国民收入指标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且在本国国内依然存在众多的需要援助的贫困人口。中国对世界减贫的贡献首先应是解决国内贫困问题, 其次才是对其他国家减贫事业的贡献。所以中国对外援助义务应是测算的目标值减去其预计该年用于国

内减贫的资金。显然, 如果考虑到中国国内存在的贫困现象和减贫事业, 那么中国的“超标”程度就更大了。

正如上文所述, 如果基于 ANI 指标的测算, 我国长期处于“超标”进行国际援助, 这一现象主要原因来自两方面。一方面, 由于我国经济增长强劲, 经济实力增强, 财政能力不断增强, 我国有充足的财力持续增加对外发展援助。另一方面, 开展对外援助是我国的对外经济和外交政策之一, 我国为了加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 巩固和强化各国对华关系, 充实南南合作的内涵, 而执行了积极对外发展援助政策的结果。

(二) 未来中国的对外援助

在可见的未来, 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会不断上升。从经济的角度看, 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主要来自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合作和国际援助, 其中前三项立足点是基于商业利益, 而国际援助的立足点是国际关系和国

表 5: 2014-2025 年中国援助规模估算

| 时间 | 中国经济 发展水平估计 ¹ | 模式 1-4 的援助额测算(亿元) | 援助动机和利益 | 援助可 参照国家 |
|------|-----------------------------|--------------------------------|-------------------------------------|-------------|
| 2014 | GNP:62.47, ANI: 6921 | 模式 1-4: 213, 208, 219, 4347 | 以进行国际合作、改善国际关系为主, 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和履行国际义务为辅 | 新兴市场国家 |
| 2015 | GNP:68.72, ANI:7613 | 模式 1-4: 231, 260, 241, 4810 | | |
| 2016 | GNP:75.59, ANI:8375 | 模式 1-4: 251, 325, 265, 5291 | | |
| 2017 | GNP:83.15, ANI:9212 | 模式 1-4: 273, 407, 291, 5820 | | |
| 2018 | GNP:91.46, ANI:10133 | 模式 1-4: 296, 508, 320, 6402 | | |
| 2019 | GNP:100.61, ANI:11147 | 模式 1-4: 322, 636, 352, 7043 | | |
| 2020 | GNP:110.67, ANI:12261 | 模式 1-4: 350, 794, 387, 7747 | | |
| 2021 | GNP:121.74, ANI:13487 | 模式 1-4: 380, 993, 426, 8522 | | |
| 2022 | GNP:133.91, ANI:14836 | 模式 1-4: 412, 1242, 469, 9374 | | |
| 2023 | GNP:147.30, ANI:16320 | 模式 1-4: 448, 1552, 516, 10311 | | |
| 2024 | GNP:162.03, ANI:17952 | 模式 1-4: 486, 1940, 3079, 11342 | 履行国际义务, 改善国际关系 | 高收入 |
| 2025 | GNP:178.23, ANI:19747 | 模式 1-4: 528, 2426, 3386, 12476 | | |

注:GNP 和 ANI 含义同前文, 其中 GNP 单位为万亿人民币, ANI 单位为美元。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估计值以 2012 年数据为基准, 按照年均增长率为 7%, 年通胀率为 3% 的水平估算, 不考虑汇率变动, 也不考虑人口的变化。2012 年的 GNP 为 516282 亿元, ANI 为 5720 美元。

际合作,其更强调单边资金输出。就发展规模来看,基于商业利益的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将是国际援助不可比拟的,但是就撬动国家双边关系、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履行国际义务等方面来看,国际援助的边际收益远远高于前三者。综合援助的国际义务和收益考虑,未来中国的对外援助规模将随经济实力的增强而增加,其比重也将会逐渐提高。

未来的10年内,中国的经济总量很可能接近或超越美国而居世界第一,所面临的援助压力会越来越大,但就人均国民收入而言,我国达到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有漫长的路要走。此外,国内尚有近1.3亿的贫困人口,如果大规模提供国际援助,将面临着巨大的国内舆论压力。总体看,中国的经济总量巨大,而人均收入水平远未发达,国内发展也极不均衡,扶贫任务依然艰巨。在这种国情下,如何提供对外援助、规模多少合适、参照标准是什么?这将是我国政府迫切需要考虑的课题。

如果将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GDP)为1.2万美元视为跨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显然中国还需要数年的时间,简单按照7%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将在2024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届时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国际发展援助责任将提出更高的要求。基于对经济基本状况的如此判断,我国在2024年前按照现行的南南合作模式提供援助面临的政治压力较小,而如果进入高收入国家后,再按照当前基于南南合作方式提供

对外援助就会承受较大的国际政治压力。而即便是在步入高收入国家之前的阶段,南南援助模式下我国每年又该提供多少援助,这种援助规模置于世界范围处于什么水平?而当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后,按照GNI的基准提供援助对我国而言是不利的,也是不合理的,这也是本文提出基于ANI标准的援助模型的出发点之一。为此,有必要对未来我国一段时间内的对外援助规模进行简单的估计。

对我国未来10年内的援助义务的测算必然需要尊重一定的模式标准。以下设计四种援助模式,并进行援助规模的大致测算,仅作为对比分析的一个大致参考。模式1是按照我国新世纪以来的行事基准进行援助,即认为当前我国对外援助规模主要基于我国经济总量的考虑,而忽略人均收入的影响。模式2是按照现行发达国家基于ANI的援助标准,即基于等式(8)来推算。模式3是对照关键国家,即在步入高收入国家前参照俄罗斯标准,由于俄罗斯近年平均援助占GNP约0.03%,另外,近年我国的援助额占GNP比重约为0.04%,综合考虑选用GNP的0.035%用作对外援助;而在步入高收入国家后(2024年后),可参照美国的援助标准,近年美国的援助额占国内总收入平均值约为0.19%。模式4按照联合国提出的按照GNI的0.7%的标准进行援助。四种模式下援助数据测算见表5,可见四种模式下,中国对外援助国模差异较大,模式1规模最小,而模式

4援助规模最大。

四、结论与启示

通过前文的分析,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与启示:

首先,现有的官方发展援助筹资模式是基于上世纪60—70年代的环境而制订的,并不符合当前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且在援助实践中,OECD国家并没有良好的履行记录。当前按照经济总量指标—GNI基数来指导筹集官方发展援助资金并不合理也不符合实际情况,国际社会在确定各国的国际援助义务时,应该充分考虑一国国民的富裕程度,即人均国民收入差异性。

其次,理论上讲,基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援助模型更加科学和合理。本文建立了相应的计量模型,即 $GR=AR=b_1+b_2 \times ANI$,认为人均收入越高,应该承担的援助责任就越大,而不是笼统地按各国的经济总量简单规定0.7%的比例。此外,本文利用发达国家的数据,对基于人均收入筹资模型的参数进行了简单估计。

第三,如果基于经济总量指标来测度,发现中国对外援助水平是远远低于高收入国家的。实际上要衡量中国是否履行了对外援助的责任或义务,应该要考虑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和本国的减贫问题。如果将这两个因素包括在内,并用发达国家的模型来度量中国的援助水平,发现我国长期以来,实质上是在“超标准”实行对外援助。未来,中国必然会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在此之前中国沿用南南合作援助模式在政

治上是可行的,但所受的国际压力会随着人均收入和经济总规模增长而不断增大。本文测算了四种援助模式下中国未来十余年内的援助规模变化情况,依照不同的模式,援助规模相差甚大,这些不同的援助模式为政策制订者提供了一些理论的对照。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中国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本文得到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援助有效性、发展有效性与中国对外援助的质量研究”(13BJL054)的支持。]

参考文献

黄梅波、熊青龙:2012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与国际发展援助,《国际经济合作》,2013 年第 2 期。

张郁慧:《中国对外援助研究(1950—2010)》,九州出版社,2012 年 1 月。

Clemens M.A. and Moss T.J.: The Ghost of 0.7 Per Cent: Origins and Releva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id Targe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evelopment Issues, 2007(1): 3-25.

Clemens M.A., Kenny C.J. and Moss T.J.: The Trouble with the MDGs: Confronting Expectations of Aid and Development Success [J], World Development, 2007(5): 735 - 751.

United Nation: Monterrey Consensus on Financing for Development [R], Monterrey, Mexico 18-22 March 2002.

United Nation: Rio+20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Forum[R], 2012.

United Nation: The Future We Want [R], September, 2012.

2014 年世界投资报告即将发布

本刊讯 联合国贸发组织(UNCTAD)将于6月24日发布《2014年世界投资报告》。《世界投资报告》是联合国贸发组织在分析和研究各国(地区)外国直接投资(FDI)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发布的全球FDI最新趋势及前景预测年度报告。该报告是各国政府进行外资管理和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也是备受全球金融界和投资界人士关注的权威性研究成果,该报告的发布已成为业界关注的重要事件。

今年的报告以“投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行动计划”(Investing in the SDGs: An Action Plan)为副标题。报告在提供了外国直接投资领域的最新数据和趋势,以及相关政策之后,把今年的关注点集中在投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上,并且提供框架,以便了解并且强化在发展中国家私营领域为了取得积极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成果而发挥的作用。

报告指出,在经历了2012年的衰退后,全球FDI在2013年重新走上增长的轨道。流入发达国家的FDI有所增长,但是仍不到全球FDI流量的40%,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FDI再创历史新高。全球FDI流出量也有所增长,这主要是受到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TNC)的推动。由于经济形势,尤其是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前景向好,未来三年全球FDI流量有望增加。不过,一些新兴市场依然脆弱,再加上政策的不确定性和地区冲突带来的风险,FDI的上涨势头仍有可能受到打击。

在投资政策方面,报告指出,2013-2014年的大部分投资政策措施仍然有利于投资促进和自由化。不过,限制投资的政策所占的比例进一步增加,尤其是针对FDI的政策。随着国际投资协定体系的扩大(包括通过许多重大区域协定的谈判),再加上投资仲裁有增无减,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报告为世界各国的改革提供了几条道路选择,并且就全盘改革方案中的关键因素提供了建议。

为了给“千年发展目标”寻找替代框架,联合国、成员国、国际组织,以及民间组织一直在协商制定一系列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和手段。今年的报告也为实现这个目标做出了贡献,报告重点研究了四个问题:一是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过程中面临的投资差距,尤其是私营领域的作用;二是评估获取这些资金的主要渠道,以及如何使之发挥最大功效;三是如何以最佳的方式把它们运用到“可持续发展目标领域”,如基础设施、供水和公共卫生、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的缓解、健康和教育等;四是如何在把风险和缺陷降至最小的前提下,让此类投资的积极影响最大化。最后,报告为“私营投资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行动计划”。

(肖前)